

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作者：章诒和

(上接3月16日 第B4版)

四、易主

也有让人兴奋的事，那就是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公布。李宗恩为此而撰文，写道：“在旧社会里，我是一个不懂政治也不大过问政治的人，反动统治政府也不要我们这样的人过问政治，这次我有机会参加了全国政协委员会所领导的学习和讨论，我感到这是我生平最大的光荣，我深深认识到了一个公民的光荣权利。讨论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扬了民主的精神，例如我们提到了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这次公布的宪法草案中第九十五条就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的保护和鼓励。这次公布了以后，还要展开全国的民主讨论，这种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正代表了我们的宪法的本质，它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是人民的宪法，这是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根本不相同的。”李宗恩之所以兴奋，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以为中国终于有了民主和法制精神；二是认定国家将对科学研究给予保护鼓励——这是1954年的事，那阵子，非但“不懂政治也不大过问政治的人”高兴，懂政治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也高兴。因为都相信了那部宪法。

同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与上一届有所区别的是，李宗恩从科学技术界调整到医药卫生界。这个“移位”，更符合李宗恩的专业，也更符合需要。需要什么？需要他出来讲话，以协和院长的现身说法，在抗美援朝的政治形势下批判美帝，批判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倾向。

12月25日，他登上政协大会的讲坛，他说——

……经过五年来在党的关怀和不断教育下，我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基本转变，使我从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下解放出来。现在回想过去，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却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所培养出来的典型人物。过去的协和医院可以说是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典型机构。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培养我这样的一群人来散布亲美亲美的思想，以达其侵略的目的。

我很早就到英国去读书，长期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和熏陶。回国后，1923年

我就钻进了美国垄断资本家煤油大王所创办的协和医院，在十余年的过程中，我就被培养成为一个亲美崇美、敌我不分、忘掉祖国、忠实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代理人……从北京解放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初接管以前这一阶段中，我一方面坚持美国‘标准’和‘医学教育制度’，一方面对政府的一些措施采取应付、拖延、抗拒的态度。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文化特务麦克斯之流撤退后，我还向协和美国董事会汇报协和情况，并一再表示努力维持这样据点，甚至在1950年秋，军委卫生部都为志愿军伤病员向协和商借病床时，我在思想上还很抗拒，唯恐摧毁美国的‘标准’和‘制度’，怕丧失这块阵地。在一九五一年政府接管后，协和同美国的关系虽然断绝了，但我在思想上还是反动的。处处还留恋着美国的‘标准’和‘制度’。

接管后，在党和上级的领导教育下，在群众的督促下，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在思想改造的运动中所揭露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具体事实，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由于党对我的关怀和信任，让我在原岗位上继续工作学习，我得到了进一步改造的机会。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认识到实质上我是在帮助美帝国主义执行其侵略政策。我痛下决心，彻底清除我亲美崇美的反动思想，坚决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永远站在人民方面，全心全意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

这个发言，既是研究李宗恩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当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重要材料。他作为某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不得不站出来表态，就像后来批判胡风，中国的名作家无不撰文表态一样，谁都摆脱不了的时代语境。在一个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国度，许多学科本不具备“独立”、“自主”的意义，“五四运动”所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有“过度深入政治性”的严重倾向，以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作用，致使很多专业之士停留在“工具性”层面，始终不能上升到灵魂主体的高度，而中共意识形态在集权制度下的无孔不入，迅速成为主宰人的强迫性力量。于是，专业领域的“高大”与在政治上的“卑微”，神奇般地融入同一个人的身躯。这一切，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波涛，将不再壮丽地飞溅起来。所遭之变，所遇之时，他们既是被逼的，也

是自觉地走上“俯首帖耳”、“唾面自干”的可悲道路，且注定要经历大致相同的厄运。

五、划右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要叫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在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的思想让他们去上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章伯钧现场听完讲话，兴奋异常。跨进家门，西服都没顾得上脱，就和家里人讲起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对民主党派提出“互相监督，长期共存”方针。不止是他，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听进去了，也都信了。费孝通撰文称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尽管有人于此前的运动中受到审查或批判，但天真的文人总觉得未来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期待。

在中共直接推动下，各个民主党派都放手大干，招兵买马，发展组织。按章伯钧的计划，希望农工民主党在两年发展之内，扩充到一万五千人至两万人。每个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方向是按界别划分的，民革是国民党前军政人员及子女，民盟是高校，九三是科技人员，民进是中小学教师，民建是工商业者，农工党是医药卫生界。在吸收人员方面，都注重吸收各个领域的头面人物，和重要机构的组织建设。在农工民主党，章伯钧特别注意著名中医施今墨，著名西医李宗恩，特别注意中医研究院，中医医院，协和医院，中华医学会等几个大单位的支部设立。在这个政治背景下，李宗恩于1956年参加了农工民主党，那时医学界人士参加“农工”的为数不少，而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对爱国知识分子而言的



1950年李宗恩(第一排右三)在麦克斯(右二)从医20年的庆祝会上，右一为协和军代表张之强。

确具有吸引力。从1956年开始，李宗恩和章伯钧夫妇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往来。往来的形式从开会、座谈，到拜访、吃饭。往来的前期内容是发展医药界人士参加农工党；后期内容则是“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

这是他们的交往，也是他们的罪行。比如，1957年5月在北京饭店，章伯钧请李宗恩等五位医学专家出面做召集人，请医药卫生界高级人士座谈“党群关系”以及“有职无权”等问题。在会上李宗恩说：“协和以往是党委领导，‘党委领导’四字对我很抽象，连党委是谁我也不知道。”又说：“如说‘墙’，协和有二道墙，一是党群之间的墙，一是军人与非军人之间的墙。”这个座谈会后来成为有名的“黑会”，仅次于民盟中央6月6日六教授座谈会。李宗恩的这两段话，即成为他定性为右派的证据。在“大鸣大放”阶段，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认为是1949年后政治上最宽松的时候。自然，李宗恩的话也就多了一些。他的话大多与医科教育相关，大多与现代医院的管理相关，这也是他久存于心的基本观点，无非借鸣放的机会说了出来。

——待续——
(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